

熊和平
著



Student Corporeity and
Education Truth

学生身体与教育真相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Student Corporeity and
Education Truth

学生身体与教育真相

熊
和
平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生身体与教育真相 / 熊和平著. —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8-13344-9

I. ①学… II. ①熊… III. ①中小学教育—教育理论
—研究 IV. ①G6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8624 号

学生身体与教育真相

熊和平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88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344-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
“身体现象学视野下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研究”
(批准号CHA100140) 研究成果



自序：知识、身体与学校教育

一、从两本书聊起

三年前，在一次学院组织旅行的火车上，坐在身旁的同事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本名叫《学校在窗外》的书。作者是黄武雄，台湾学者。我觉得书题很不错，非常切合我对学校教育一贯反逆的立场。于是，迫不及待地从事手里拿来翻了翻。封面上的插图蛮有意思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背朝观画者，双手倚靠在窗户上，似乎在向窗外眺望什么。那应该是学校教室的窗户。作者为什么要说学校在窗外呢？

结束几天的旅行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上当当网买了黄武雄教授的两本书来读，除了《学校在窗外》，另一本是《童年与解放》。作者对人生与教育一些常识性现象的质问，发人深思。比如，人为什么要活着？孩子为什么要上学？童年是什么？知识是什么？学校要不要存在？抽象与具象相互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而没有参悟通透的问题。书中的许多观点，与自己的观点颇为相似，而且对学校教育的批评态度让我很受启发。比如，他在批评当代学校教育时曾说：

目前学校的主流价值与教师正在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利于学生的心智成长，它们严重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我谈的不只是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一样都是一丘之貉。我自己在大学讲台站了半辈

子,常常惭愧自己在扮演的角色。我提倡通识教育,正因为这层自觉。目前学校教育的主流是把知识片面化、工具化。我希望在主流思维之外,能给孩子另一面窗。^①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李丁赞评价黄武雄的儿童教育研究时提到:从表面上看,他是在谈儿童教育的问题,但实质上,从教育问题谈到更基本的知识论问题,甚至从知识论延伸,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存在、伦理、美学等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从《学校在窗外》与《童年与解放》的目录拟题中便可略知,黄武雄教授对学校教育哲学的基本立场及其通俗易懂的叙事性表达,读来诱人遐思。比如,“人即目的”“自然的子女”“童稚世界无限”“儿童心智的河床”“解放的心灵”“人在知识中异化”“知识是人的创造经验”“学校教育本来面目是一顶小丑帽”等等。

不过,看过黄武雄教授在《学校在窗外》扉页的献词,我顿生悲情。书稿原来是他病厄中完成的。三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确定作者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至少他的作品仍活着。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们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通过作品交流,甚至超越生与死的界限。作者用写作、用思想、用生命来诠释“学校教育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生死相依,相互印证。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生和死一样重要,都是人生必须去探讨与面对的基本事务。

如果说,《学校在窗外》主要探讨了学校教育知识论问题,那么,《童年与解放》则深入探讨了关于“童年是什么”或“儿童是什么”等学校教育的本体论问题。此书,就其深度与广度而言,绝对称得上是台湾教育与教改的扛鼎之作。黄武雄教授在著作中用心良苦地揭示儿童成长的真相,让我不禁联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以及我跟学校教育的冲突和妥协。或许,一个人的童年成长史,是当代学校教育史的最好注脚;童年的秘密,蕴藏着一个人成年后的秉性气质,甚至一生的命运的发展谱序。

二、在田野中游戏

我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我所在的村庄上根本就没有幼儿园。但有小

^① 黄武雄:《学校在窗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学，即“村小”，是相对于乡镇上的“中心小学”而言的。它离家很近，不到六百米的距离。

没上幼儿园有没上幼儿园的好处。七岁之前，我不用上学，就到田地里去玩。玩伴除了两个弟弟之外，还有村上几个同年出生的发小。一年里，春夏是比较好玩的季节，其次是秋冬。阳春三月之后，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到红花田里、油菜地里乱跑。黄红绿相映的大地，像无边无际的操场，我们在其中捉迷藏、采花朵。花丛里，蜜蜂很多，偶尔也有大黄蜂，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田地里的蜜蜂或者黄蜂蜇伤。不过，如遇上水渠，发现水中有鱼，大家伙儿就把水渠截断，舀干水后，把鱼儿活捉，回家后交给父母，还可以得个表扬，捉鱼的游戏算是结束了。夏天的时候，大人们起早劳作，中午会午休，而且让我们小孩子们也要午休。午休对我们来说，是个挺折磨人的任务。我们怎么也睡不着，趁大人们睡着了之后，便偷偷地从家里溜走，跑到村庄的后山去抓甲壳虫，或者掏鸟窝、摘野果；要不就到生产大队的田角边，抓泥鳅与黄鳝。由于天热，泥鳅与黄鳝通常躲进田角些许凉快的地处，我们极易抓住它们。父母虽知道我们没有午休，但有收获带回家，倒也没责怪我们贪玩、闹事。秋天里，除了放牛、捉鱼虾、摸田螺之外，有一种很好玩的的游戏是钓青蛙。那年头，青蛙好多，易钓。我和弟弟经常相约钓青蛙比赛，若能钓获十来只大的野牛蛙，就可美餐一顿。小青蛙钓回家，主要喂给鸭子吃，不过，勇敢些的鸡也会与鸭子争抢着吃青蛙。冬天里，我与弟弟的主要任务，是看管好自家的禽畜。按时把鸭鹅引到村口的门塘里去，傍晚时分再把它们招引回家。时间多的话，还要到小河里捞些浮萍、螺蛳，到田地旁打些野草、菜叶之类的东西给它们吃。家里养的猪，是最让我们头疼的家畜，它们在村庄上到处遛弯，回家的自觉性差，没有活动的规律，很难让人琢磨到它的行踪。有时候，为了确保猪的安全，让其准时回家，我与弟弟轮替值勤，跟着猪。它们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现在想起来，村庄附近广袤的田野，大概就是我的幼儿园。与玩伴们一起跟动植物的亲密接触，大概就是我的童年的游戏。那些通过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而植入骨子里的身体体验，日后成为我的身体愉悦感的先验性的动力来源，甚至作用着我的身体的日常活动方式。这使得我在学校中不断发生知识与身体的冲突事件，比如贪玩、逃课、不在乎考试等等。那些先验性的身体知觉，埋藏于我的生命价值论的深处，常常向我暗自发出“身体向何处去”的隐秘指令。听从身体的律动，是我在学校中发挥自我主体性的基本表征。生命价值论中的“身体感知优先”原则，影响着我的人生、社会与自然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与判断，成为人生价值谱系中的一个标杆。

现在,常会有研究生跟我提出“不像问题”的问题:如何做科研选题,如何转变思维方式,怎么样才能有学术创新,如何发现独特的研究视角,看哪些文献参考书,以及科研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我想套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或者当代课程理论家威廉·派纳(William F. Pinar)的话:“从内部出发。”即从你的精神世界出发,从你的身体律动出发,研究你自己。这是一种基于身体传记的研究态度与立场,即通过身体视角介入的一种关于自我的精神分析或自我成长史的考古学话语分析。一个人如果把生命体验,即身体体验到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对研究对象抱有热烈的情感,以及持续下去的激情与动力。因为,他所研究的是自己的事情,甚至是生命、价值、伦理、美学等人生的根本性问题。不仅是波洛克与派纳等人,现当代很多思想家都是通过从内部出发、从自己出发来做研究的,并为思想史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比如弗洛伊德、尼采、福柯、梅洛-庞蒂等。

就拿梅洛-庞蒂来说,他在晚期提出“世界之肉”的概念,并最终把身体作为一种新型的现象学,即身体现象学的本体论根基。梅洛-庞蒂经常困扰于一个很多人都常惜叹的问题:我如何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童年。由于父亲早逝,梅洛-庞蒂和母亲、哥哥、妹妹生活在一起,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亲密氛围中长大,以至于后来还很迷恋其童年生活。为此,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通过身体经验,把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未来的我统一起来。一切的生活经验、时空体验都是身体的。世界是身体的,心灵也是身体的。

一个人的先验性的身体动力系统与结构,决定着其身体观、实践观、生命观等人生的基本观念,甚至有可能决定着细微的味觉观、视觉观、听觉观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观。至少,我的童年就是如此。从内部出发,最基本的路径就是从自己的童年出发。通过回溯自己的童年,来梳理人生成长的隐秘路径与意义历程的关键因素。

三、考试与屁股

父亲是“村小”的老师。我七岁那年的九月一日,他领我到“村小”报名上学。我记得,在考查上学的面试中,一位姓张的启蒙老师给我出了两道题:语文题是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数学题是让我数一百个数。写名字的事,我提前在家练了几天,面试时我好像写得很不错。但数数的时候,当我数到了七十九,就没有顺利地接下去。张老师让我停了,并说:“面试通过,可以上学了。”从此,

我便从“田野”走进了“课堂”。

考试是每个学期结束时学校最重要的事务，对学生来说也是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被灌输学习就是为了考试。考出好成绩才能得“三好学生”的奖状，才对得起老师的教养、父母的辛劳，将来才可能有前途。一年级第一学期末，我接受了人生第一次期末考试。在考数学的时候，离交卷时间还有半小时，有同学早早地交卷出去玩了，他们玩得非常热烈，教室外传来同学们欢愉的笑声。我朝窗外望去，原来有两头公牛在打架、斗角，实在太好玩了。没等答完试题，我赶忙交了试卷，跑出教室，融入了观看斗牛的景观中去了。事后，数学老师把我提前交卷只得了七十多分的情况告诉我的父亲。父亲怒不可遏地把我叫到他的身旁，扒掉我的裤子，不由分说地用教鞭连连抽打我的屁股，并质问我：“看牛重要还是考试重要？让你看，让你看……”

屁股是身体一个奇特的部分。它承担了上学的双重角色。一是学生必须靠屁股老老实实在被老师安排的座位上，以便好好地听讲，屁股必须为听讲服务，在课堂上不能随便乱动。除了双手之外，老师对学生屁股的挪动非常警觉，屁股动来动去的学生常被界定为不好好听讲或上课调皮捣蛋者，极易受到来自教鞭的威胁。二是屁股还承担着惩罚者的“出气筒”与受罚者的“受气筒”的角色。因为屁股上的肉多，相对反应迟钝，常被医院护士认为是对患者进行肌注的理想部位，而在学校，屁股则成为老师惩罚不听话学生的受打部位。相对于脸蛋，打屁股不至于让受罚者失去尊严，也不易受伤。因此，小学老师与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经常用打屁股的方式惩罚我、告诫我：上课要好好听讲，屁股不要乱动，眼睛不要往窗外看；知识在课堂，而不是在窗外。

屁股挨打，成为我小学时代的基本身体体验之一。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这种通过屁股传达心灵的感应，不断地修正我关于知识与身体、学校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我渐渐变成了一个上课几乎不动屁股、眼睛不敢朝窗外看、把手整齐地摆在课桌边沿的好学生。似乎学习成绩也上去了，父亲与教过我的老师都以我为荣，直到我小学毕业。

两个弟弟身体经验转换的历程跟我的也差不多。记得有一天，小弟在上学的路上，足足迟到了两节课，竟然是为了石头缝隙中一群小小的蚂蚁。他用两节课的时间观察蚂蚁觅食与搬运食物回巢的全过程。他把这件事兴奋地告诉了我，并送了几只他逮到的硕大的工蚁给我玩。我悄悄地告诉他，这可能闯下了大祸。果真，晚上他的屁股被打得通红。另有一天，是放暑假的前夕，我与正在读五年级的大弟在校园里玩。父亲正严厉色地把我们叫到他的身旁，我心里嘀咕，不知我们中哪一个人的屁股要倒霉了。父亲对着大弟说：“你过来。”我长舒了一

口气,原来跟我没关系。这一次,比打屁股还要严重,我站在一旁,见弟弟直接被勒令跪下了。但见父亲气不打一处地说:“你怎么可能只考这么点分数,你竟敢轻视考试!”我们都被吓得恐慌不安。大弟的这次身体重罚,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其中的具体缘由。

四、坐姿与分数

学校的教室,通常都位于一些无趣的建筑之中,它们由巨大的长方体分割而成。学生编排有序地进入不同的教室。教室里,整齐有序地码放着四至五列插秧式的课桌椅,每一列为一组,一个班大致有四至五组,六十至七十个学生。这是农村乡镇初中教室的基本格局。每一个学生都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虽然坐姿不像小学那样严格,但基本上在上课时是不允许乱动的。认真听老师讲课,不交头接耳,眼睛看着黑板,专注地做笔记,不仅能提高学习成绩,而且被视为是“三好学生”的课堂姿态的榜样,或者是校团委考察学生“入团”的参考条件。坐姿、成绩与德行通过学校教育的管理法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塑造学生的知识观、学业观与身体观的隐秘机制。

初中时,我的成绩一直不好,可能与我的坐姿不端正有关。不仅屁股易动,而且忍不住会与同桌交头接耳,或者眼睛有意无意地望向窗外。我遵从身体的律动,试图做自己身体的主。听老师的话,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学习英语、背诵单词是苦差事,学习生硬且缺乏生活气息的英语知识,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初二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在一节英语课上,李老师带读单词的时候,我又一次走神了。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具体内容已经忘了,好像是关于雷锋叔叔的故事),就忍不住跟同桌讲了讲。刚讲了几句,被发现了。李老师高高地扬起他的课本,敲打着我的脑袋,大声地吆喝着说:“上课不许笑,自己不好好听讲,就不要影响其他同学,不要破坏课堂纪律。”我感到很委屈,“因笑获罪”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身体记忆里,这不是记忆术在起作用,而是记忆伦理的先验性选择。

大致是由于心智晚熟的缘故,初中的我常为两件事情伤脑筋。一是课堂的坐姿,总是不符合老师们的要求,为此没少挨骂或体罚。最常被老师拿出来训骂人的话是:你不好好读书怎么对得起父母;最常见的体罚就是让你在教室的某个角落里罚站。二是考试的成绩,各科成绩综合排名(俗称总分)一般在班级中下等次。不过幸运的是,大概是因为学校离家很远,不像上小学的时候那么近,父

母没有给我什么压力，不会因考试成绩不好而过于责骂我。那时，不知怎么的，当我的政治、生物、地理等几门功课还在为及格分而挣扎的时候，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各门课程都能考上九十多分。他们是班级甚至是全年级的“学霸”，是考试的怪物。我经常反思：成绩上不去，难道真的跟上课时的不端姿态有关系吗？

在应试教育的训条里，学习与成绩是成正比的。这符合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 Ebbinghaus）关于无意义记忆材料遗忘曲线（Forgetting curve）的研究结论。由于该曲线揭示了人的大脑对无意义记忆材料遗忘的规律。人们可以从遗忘曲线中掌握遗忘规律并加以利用，从而提升自己的记忆能力。19世纪中叶以后，遗忘曲线对人的记忆认知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需要承认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中学校园里，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规律与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官能主义心理学仍然是学生为了应付考试、提高学习成绩的主要心理学依据。这些所谓的科学依据被学生运用到记忆大量的诸如汉语文言、英语单词、数学方程、物理公式、化学元素、政治教条、历史事件、地理区划等近乎“无意义材料”。知识远离生活经验，而跟大脑的记忆术相关。在知识、考试与遗忘的关系中，学生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考试前对知识点（即“考点”）记忆很牢，考试结束之后，渐渐遗忘。这种在应试化的学校教育环境下产生的中国式遗忘规律，是对艾宾浩斯的研究结论的戏剧性修改。考试时间表，是遗忘曲线的临界点。在临界点之前，考生尽可能清晰地记住可能会考到的知识点与解题技能，考后再慢慢遗忘，直至全部“还给老师”。不难发现：在各类考试前夕的考场边缘，在考试铃声响起的前夕，仍有大量的考生在拿着课本或笔记本使劲地记忆。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与国家学校制度的安排，20世纪8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可以考中专、中师或幼师、技校，能考上的学生都是应试精英，他们是我望尘莫及的“学习英雄”。对于农村学子来说，通过“中考”而“跳龙门”是他们脱离乡土的极好机会。这种强烈的学习外在动机，塑造了他们的应试型学习风格，比如起早贪黑，以及相应的人际交往的人格特征，比如不愿意与人合作等。

我所在的初中有两道怪异的校园风景：一是大规模学生的校园晨读；二是寂静无声的课堂晚自习。每天清早，天刚亮，就有许多学生拿着英语或语文之类的课本，走向校园附近的田野，他们起得比耕地的农民还要早，选择一条僻静的小路，来回踱步；他们又似勤勉忠贞的佛徒，口中念念有词，为的就是脱离乡土的宏大梦想。晚自习的情况跟晨读景观差不多。夜深人静时分，学生们仍在灯火通明的教室里播撒着理想的种子。

在这种“学疯”的渲染下，我在初三（寄宿）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次励志的决定：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在某次期终考试综合排名上超越邻床的室友。我制定了一个

严格的学习作息时间表以及背诵内容的清单。最简单的原则就是,首先要在学习时间的总量上超过他。于是,天刚蒙蒙亮,我趁室友还没睡醒,就静悄悄地起床,来到教室里或田间小道上晨读。这种状况维持了几天,室友发现我在暗中努力,变得有些不安起来。有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清早,我照例轻手轻脚地离开寝室,准备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任务。来到教室一看,室友已然在那里学习多时了。我心生纳闷,他不是还在被窝里睡觉吗?事后得知,为了不让我发现,原来他把自己的衣服和枕头都放在被窝里,弄成一个鼓鼓的假象,自己则金蝉脱壳地晨读去了。相对于室友的拼搏劲头,我只好自叹不如。

对于学生来说,遗憾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有能力有念想但离“中考”成功总是差之毫厘;二是学习能力一般但付出艰辛努力却总不能成功。我的初中毕业班的同学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不幸的人。除了极少数成功考取了“中专”“中师”,绝大多数还是在挤独木桥的游戏中落入水里。我的能力一般又没付出多大努力,当然不会是极少数中的幸运者,但也不能算是落入水中的不幸者。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水平,根本就没有动过侥幸成功的念想。

五、足球与逃课

一向严格的父亲,不但没有责怪我“中考”的失败,反而到处托人找关系,为了让我上县城的重点高中。就这样,我勉强进了高中。机会得之不易,我向父母承诺: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辜负父母的期待与辛劳。

大概是由于对父母郑重承诺的激励作用,我整个高一年级读书很奋进。基本上都遵从学校的制度,听从老师们的教导。高中三年的班主任姓徐,三十年后我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破天荒地表扬我“天资聪颖”,并把这句话写进了我的期终考试的成绩报告单里。在此之前,没有哪位老师如此大度地表扬过我。我把徐老师的表扬与大致班级总分排名前十的成绩,自豪地告诉了父母,算是兑现了我当初的承诺。

但好景不长。高二我迷上了踢足球,有点跟足球相见恨晚的感觉。对我来说,足球场是天堂,教室是地狱。足球游戏,是一种身体经验与自我实现的互动性游戏,远比课堂的计算公式、知识逻辑与基本原理要有吸引力。它符合人本主义与存在哲学的基本要义: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即秉持一种跟着感觉走的价值立场,去与空间、时间共舞。足球场与教室在我的高中生活中形成了鲜明的空间知觉的对照。虽然球场是方的,但足球是圆的,它运

动多变，没有刻板的运动规则，急缓变换，可快可慢，节奏感很强，全靠踢球者的自由掌控。足球运动既是属于身体的，又是属于心智的；既是属于个人的，又是属于团队的；既是属于技术的，又是属于美学的。

教室则死气沉沉，它是一种填鸭式的空间，完全受凯洛夫的“课堂五步法”所操控。布鲁姆(B. S. Bloom)的知识目标分类学、掌握学习理论及其评价原则也参与了教学文化与教室空间属性的建构。教室是技术操作主义者的领地，它更像是工厂的车间，学生在流水线上简单机械地重复着知识的加工与编码。学生淹没在所谓的科学知识符码的纸堆里。人是知识的附庸，是文本的附庸，是考卷的附庸。教科书、复习资料与例考试卷构成了教室空间文本的基本类型。对我来说，教室让人压抑、紧张，甚至恐惧。除了想多看几眼心中暗恋的女生之外，我根本不想在教室里多待上些时间。我的脚步听从着身体的律动。

逃课是必然的。记得高二的时候，有一次，五月份的天，有些热，下午有历史课，我们几个球友逃课去踢比赛。踢完球回来，我们各自抱着自己的衣服，趁老师背身板书的时候，从教室的后门溜进教室。我定睛一看，没几天的工夫，历史老师竟然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讲授到了辉煌的唐朝。心想，这回糟了，“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知识都讲完了，他讲得也太快了！我并无悔意。逃课，是一种美妙且充满快感的叛逆旅程，逃课的路上充满阳光、动感与迷人的风景，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逃课是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旅行。我依然记得，在一个灿烂的初春季节，最远的一次逃课，竟然从校园一直逃到了李白所描绘的“庐山瀑布”的脚下，而且一逃就是三天。我们几个球友，来到庐山脚下，对着瀑布呐喊、尖叫，尽情地向蓝天、高山与溪水抒情、撒野。

足球改变了我高中学习的正常秩序。我与学校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班主任徐老师开始找我谈心，声称“再不回头就让足球给毁了”，一定要面见我的父母。有趣的是，在高中毕业二十周年(2008年)的同学聚会上，班主任见到我，不假思索地提到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他与我父母的那次面谈，其次是我跟足球的情缘，再次是庐山脚下的那次遥远的集体逃课。徐老师的现象学式的回溯，深涵着他对一个普通并有些异类的学生的情感记忆。

第一年的高考失败了。我不得不重新走进高三的教室，拿起书本，走进纸堆里，去拾补由于逃课落下的知识。这是学校对我的惩罚。

六、及格万岁

不得不收敛源于身体的欲望与激情,接受学校知识的考验与洗礼。经过两年的挣扎,我勉强考上了一所本地的师范院校。由于我能逃离乡土,实现了祖辈们的梦想,以及“非农”户口的奢侈期望,父母高兴极了。至于我在学校学到了多少知识,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在父母看来,辛辛苦苦地供我读书,不是为了学校那点可怜的知识,而是城镇户口。这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大学还可以包工作分配,我似乎从此便可衣食无忧。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压根儿就不算富裕的父母竟然下决心宰了一头黄牛,宴请全村的邻里亲朋。我为父母的决定大吃一惊。看得出来,我在高考中获得的卑微且迟到的胜利,是全家的重大喜事。在准备欢送我上大学的庆功宴席上,我顿感这种盛大且喜庆的仪式,根本与我无关。庆功仪式,是高考制度链条的最后环节,它是那个时代的学校教育文化的一部分。而我只想到了马上可以尽情地踢足球,享受身体带来的欢愉与满足。

新生报到时,早于我两年考取这所师范院校的高中球友,接待了我。他把我领到宿舍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踢球去。来这里以后,你算踢得好的!”我迫不及待地问他:“平时要考试吗?”他回答说:“有是有的,每学期末有几门考试,但只要六十分就行了。你不用担心,考试前一周复习复习就可以应付过去。平时想踢就踢,没人管你。”

知识、身体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不仅在国家学制中的不同层次、阶段、类别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深受一个时代特定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影响。知识,不仅仅是属于学科的,也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甚至它不仅仅是属于掌握知识的人的。知识未必就是培根所宣扬的力量,知识也未必就是财富。在当代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里,知识与价值有关,知识与权力有关,知识与政治有关。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上逐渐兴起一种“读书无用论”或“知识无用论”的社会思潮。所以,经常听见“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诸如此类的社会言论。这种知识观传入大学之后,对于当时的学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我的学校教育史上,身体的地位史无前例地超过了知识的地位。由于考试的作用被弱化了,知识随之变得渺小起来。我们根据大学校园的人气指数重新给学生划分等次:第一等是球打得漂亮的;第二等是唱歌跳舞潇洒的;第三等大概就是愿读书且成绩优秀的。我在球场上狂奔,却在课堂上昏睡。这是高考

胜利带来的最大好处。

一个六月的下午，有郭教授的政治经济学的课，它是我们政教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由于午睡过头了，我一觉醒来，看看时间，竟然迟到近半小时了。环顾宿舍，室友都不在，连连责怪他们太自私了，去上课都不叫我一声。我快步流星地来到上课的教室，让人意外的是，全班四十多位同学只有两位女生在教室里上课，郭老师表扬我说：“坐下，来了就好。”

我感激郭教授的宽容。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学期刚开始的时候还在上课前点名，但是这一招好像用处不大，索性后来对缺课或迟到的学生也就不点名了。不管多少同学来听课，郭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充满激情，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刚刚建立的中国股票市场深表怀疑，并预言随后的几年，定将有不少股民在股市中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有股民跳楼，不会是什么新鲜的事态。郭教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有时会在校园偏僻的角落不经意间看到他肩挑着粪桶，给菜园里的蔬菜施肥。

读书无用、轻视知识的风气，让身体的欲望膨胀起来。身体在我的大学校园生活中占据了本体论地位，一切从身体出发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参加了两支足球队：一支是系队，我的球衣号码是5号；另一支是校队，球衣号码是2号。这些球衣仍然珍藏在我现在的衣柜里，成为青春激情、生命活力的历史证据。踢足球占据了大学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知识，我只有在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前才会想起它，并到图书馆的自习室，提前占个座，从事有关知识加工的事务。比如，复习老师勾画的重点范围，整理一些少得可怜的读书笔记，背熟考试重点，等等。

跳舞，是校园夜生活的主要消遣方式。跳舞与知识无关，更与学科无关，但与身体密切相关。跳舞是身体的感性表达，关键要看音乐旋律与身体节奏的协调程度。身体通过音乐而舞动起来，这不需要逻辑。当舞曲响起的时候，还能够坐得住的人，跳舞水平都很一般；当一个人随着舞曲自然而然地飘逸起来的时候，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舞者，此时此刻他未必觉得自己是在跳舞，而是在生活，用身体在生活。跳舞与成绩无关，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未必舞就跳得不好。知识则是理性与逻辑的，它的获得与一个人的沉思习惯有关，动辄就陷入沉思的人，成绩可能会好，但舞一般都跳不好。这一点可以从跳舞者与平时成绩的相关性中得到证明。

我在大学踢球收获了友情，以至于二十多年后我与不少球友仍然保持常态的联络。我在大学跳舞则收获了爱情，以至于当年的舞伴日后成了我的妻子。两年前，我与妻儿借寒假的闲暇时间，专门重温了一下大学母校的校园，我特地

到昔日的足球场上走了走。此情此景,过去、未来与现在,统一在时光的隧道里,统一在当下性的身体经验里。时间的就是身体的。当我与妻子走在政史系周围曲径通幽的石砌小路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坐在树荫庇护下的石板椅上,相互凝望、接吻与抚摸的浪漫且甜蜜的一幕。

身旁六岁的儿子,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大学?”

我跟他说:“这是一所伟大的大学!”

我接着说:“爸爸妈妈在这里读书的时候,还没有你。”

他反问道:“比北大、清华还有名吗?”

我说:“差不多吧!”

儿子不依不饶地说:“我将来才不来这里读书呢,我要读哈佛大学。”

我又说:“到哪里读书都一样。”

儿子说:“哈佛大学更有名,比北大、清华还要有名。”

我说:“学校就是个游乐场,知识就像足球一样,也就是个游戏。”

儿子说:“不懂。”

我说:“等你长大了,就懂了。”

由于我们读的是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大部分同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学当老师去了。我也一样。从大学校园又走进了中学校园,这次是以老师的身份,面对那些不得不通过知识、考试改变命运的学生。对我来说,这是挺折磨人的一份工作。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二十多年至今,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对学校教育一贯持叛逆立场的我,干的却是当老师的“勾当”(因为担心误人)。时至今日,我的专业研究领域竟然也是学校教育。

三个月前,大学时的班长与书记在QQ群里张罗二十周年毕业聚会的预备会,我专程从宁波赶到南昌红谷滩新区的一家酒店,重遇了几位二十年未见的大学生。除了多数同学的体形有较大变化之外,他们的面容与声音变化甚微。大家谈得更多的是当年对彼此的印象,一种经过情感现象学沉淀下来的印象。且都笑谈,学得不牢靠的那点知识,早就还给老师了。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郭教授几年前去世了,当年留校任教的几个同学还专门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席间,竟然有同学说起对我的校园印象:“读大学的时候,你经常带个耳机听外语,我们班上你算是用功的一个了。”我愕然。

七、知识在窗外

窗户，和墙、门、黑板一样，是教室的基本构件。它是光明的主要来源。没有窗户的教室是不可想象的。在主流的学校教育思维之中，对于窗户的功能的假设，即一种采集自然光用于保护眼睛或增加学习效益的假设，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主义。黑板与窗户构成主从关系，黑板是窗户的主人，黑板是知识的唯一源头。在教室里，来自窗户的自然光与来自电源线的人工光，都必须为黑板服务，照亮黑板，以便学生求知。学生的眼睛被要求盯着黑板，些时地朝向窗外，都有可能错过老师对知识的发布与讲解。在黑板、课桌与窗户组成的课堂力学结构中，身体被固定在稳定的位置上，保持特定的姿态。这不仅仅是求知的身体效益原则，同时也是主流的教育伦理教义的道德原则。

黄武雄在《学校在窗外》中表达了在学校教育的主流思维中，教室的窗对于童年的禁闭，以及对教师角色重建的期待：“放下你的身段，放下与同事竞争表面成绩的心情，与孩子们平等做朋友，真情地陪他们走一段成长的岁月。”^①学校与教师都应该在主流的教育思维之外，为孩子们打开另外一扇窗，让他们张望外面的世界，走入真实的世界。对于黄武雄来说，“那强烈对比的光影每每会出现熟悉的童年记忆，昼长人静的那种安定的感觉，安定中有着对未来无限的憧憬。那种童年悠远静谧的画面，在现世里已非常遥远，却在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窗外出现”^②。

窗，是画家热衷于表达的一种绘画元素，尤其是对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几乎成为表现心灵和精神意向的首选道具。窗给画家与观画者以无尽的想象，马蒂斯一生都在不断地画窗外，在他的意识中，“窗内窗外已融为一体了”。达利(Salvador Dali)早期最著名的画作——《站在窗前的少女》(1925)则描绘了一位背向观画者的少女，正在弯腰透过窗户向外，远眺着一片清晰、明亮、宁静的海景，表达了敞开空间与隐秘欲望之间的深层关联。黄武雄的《学校在窗外》封面上的插图《窗外》则表达了窗与童年之间的诸多不为人察知的秘密。发掘、正视与研究这些童年的秘密，是教育改革者不得不要面对的问题。即如何在教育的主流思维之外，为孩子们打开另一扇窗。

质疑学校到底应不应该存在，可能会陷入学校教育的虚无主义。相比之下，

①② 黄武雄：《学校在窗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